



在字句的溪流里淘洗时光

○ 太白文艺出版社 王 伟

2023 年孟春时节,晨光熹微,春风料峭,黄渠头地铁站外的小草刚刚探出头来。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过那条几百米的小路,小路尽头是两栋高耸的大楼——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。走进大厦的玻璃门,我不自觉地攥了攥拳头,手心微微湿润,不知是晨露,还是悄然沁出的薄汗。

推开八楼校对科的门,室内很安静,只能听见纸页翻动的窸窣声,所有人都低着头,专注于眼前的稿子。听见动静,赵田田老师从一堆校样里抬起头。待我在工位坐下,她轻轻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,从手边拿出一本历年编校竞赛试题汇编递给我:“可以先看看这个,熟悉一下编校的基本规范和稿子里常见的错误类型。”她顿了顿,又指着靠墙的一排柜子说:“柜子里有同事们以往改过的校样,也可以参考看看。”

我接过那本厚重的汇编,又从柜子里抽出几本已经泛黄的旧校样,捧在手里,感受到的不仅是纸张的重量,更是一份即将担在肩上的沉甸甸的责任。

初渡——在文字的迷宫里学步

初入校对科,我仿佛走进了一座安静的修心之所,而前辈们对待工作的态度,更成为我眼中最生动的风景。

陈勉力老师工作起来神色专注,自带一种沉静温婉的气质;赵田田老师伏案时背脊总是挺得笔直,笔尖移

动匀速平稳,那副心无旁骛的神态,自有一种庄严的气场;张泰甜老师校稿时那份全然投入的专注,常让我暗自惊叹;刘乔老师总是最晚走,却从不显疲态,反而常在我困惑时轻声点拨,言语间透着善解人意的温暖;左文思老师校稿时专心致志、聚精会神,令我敬佩……

第一个月,我只校了三本书,总计不过 30 万字。我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,每一笔改动都透着生涩与谨慎。

校对一本散文集时,午后的阳光正漫在摊开的稿纸上。我读到一句描写人物的句子:“他温厚的笑容里有一种旧年月里沉淀下来的美。”笔尖顿了顿,我总觉得“温厚”太过平常,不如“温良”雅致,便不假思索地将“厚”字圈去,在一旁工整地写上“良”。

稿子交上去不久,陈老师拿起那份校样一丝不苟地翻看,目光轻轻落在我改动的那一处,问道:“这里为什么要把‘温厚’改成‘温良’?”

我怔住了,支吾了好一会儿,才勉强说:“我觉得……用‘温良’更有文采。”

陈老师没有直接评判,而是将散文集的原稿轻轻摊开,手指抚过那句我未能细品的文字。“你看,”她的声音平和如常,“‘温厚’里有敦实、醇熟的味道,是岁月一层层叠上去的,而‘温良’更偏向性情上的柔和善意。这里写的是笑容里透出的气质,不是品格。”

她放下稿纸,看着我说:“校对员在校对时要把握好度。”

那天我独自坐在渐渐暗下来的办公室里,对着那句“温厚的笑容”看了很久。我终于明白,那一笔红,落下去的不是纠正,而是一种打扰;我自以为是的“雅致”,实则推倒了一堵作者用心垒起的墙。

从那天起,我懂得了“慎改”二字的分量。红笔不再是彰显眼力的工具,而是一盏灯,照亮那些真正走偏的字句,至于灯火之外,自有文字本身的光晕与山川。

深潜——与故纸堆的对话

不久后,我开始接触到一些迥异于从前的稿件。

《陕甘宁边区文学报刊研究》是我接触的第一本学术著作。我用了整整五天,红笔的痕迹稀稀落落地散布在稿纸边缘。交稿时,心里竟有些轻快——我以为原稿质量颇高,而自己总算也揪出了几处明显的史实和引文错误。

直到一周后的某天下午,陈主任将刘乔老师的二校样轻轻放在我面前。“可以看看。”她语气平和。

我翻开那份校样,瞬间愣住了。只见页纸上布满细密的批注,蓝笔的字迹工整而克制:有对文献出处的追索,有对表述分寸的斟酌。

那些我以为“没错”的地方,原来藏着深一层的模糊;那些我未曾生疑的叙述,实则值得更严谨的推敲。

那个傍晚,我默默地将那份校样一行一行地重读、对照、做笔记。自那之后,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身边每一位老师校稿时的习惯:看他们如何为一个不确定的表述轻声讨论,如何在厚厚的工具书里反复查证。那本厚重的《图书编辑校对实用手册》自此便很少离开我的案头,而笔下的红,也开始学着在“对错”之外,追问一句“何以如此”。

渡己——在字句里看见自己

结束实习后,我接触的书稿类型渐渐多样起来。其中最令我无所适从的,是校对诗集。那些诗句仿佛挣脱了规范的缰绳——意象在空中跳跃,句子在莫名处断裂,标点被任性地点缀或省略。起初,我的红笔焦躁不安,总想将那些“出格”的逗号、句号拉回它们“应有的”位置。直到有一次,我将诗人一句故意不加标点的长句“规范”地断开,而同事在二校时抹掉了我错误的校改,我才发觉那连绵的词语堆叠,正是为了模拟情绪汹涌、难以停顿的瞬间。那一刻,我明白,有些规则,是为了被恰当地打破而存在的。

这种领悟,让我在校《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·呐喊》时变得更加主动。我会为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去查阅背景,为一种特别的句式停顿进行思索。这些旁逸斜出的功夫,无关绩效考核,但它们让那些铅字在我眼中活了过来——它们不再是平面上待检的符号,而是一个个颤动的灵魂与一副副时代的骨架。校对,从一种向外的审视,慢慢变成一场向内的对话。

我将这份困惑与转变讲给朋友夏初七。她静静听完,沉思片刻,莞尔一笑:“你这哪里是在校对,你这是在‘渡己’啊。”

“渡己?”
“是啊,”她望着我,目光清澈,“你手里的红笔,起初只是一把尺子,丈量对错,执行铁律。可如今,它更像一支桨——你在字句的河流里,不再只忙着纠正航向,而是开始感受水流的速度、温度,甚至倾听两岸的风声。你从规则的执行者,慢慢变成了理解的参与者;从文字的审判官,尝试去做艺术的同行者。这不就是将那个拘谨的‘小我’,渡向一个更宽阔、更敏锐的‘大我’吗?”

她的话如钟声荡开暮色。我蓦然回首这两年走过的路,那些在文体间切换的摸索、面对标点时的纠结、沉浸

于书籍世界中的沉思……每一步,原来都不只是在处理文稿,更是在安顿自己。红笔画过纸面,画出的不仅是错误,还有我认知的边界;灯光照亮校样,照亮的不仅是文字,还有我未曾察觉的内心沟壑。

所谓“渡己”,或许就是在这一横一竖、一撇一捺的修行中,将机械的动作化为用心的体察,将外部的规范内化为从容的智慧,最终在万千别人的文字里,清晰地看见自己——那颗愈发敬畏、愈发柔软,也愈发坚定的初心。

两年淘洗,七百日躬耕。当我再次站在这条曾走了无数次的路上,身份已悄然改变——我不再是那个执红笔的校对员,而是成为一名需要执蓝笔的编辑。

成为编辑后的第一个清晨,我仍走向八楼,但这次是转身至 803 室综合出版中心。桌上不再是校样,而是散落的选题报告、初审稿、图书出版合同。那一刻我恍然大悟:校对是在既定的河床里淘洗金沙,而编辑,是要在茫茫荒野中看见一条河的走向。

红笔赋予我“不敢轻慢一字”的敬畏,蓝笔则交给我“愿为万言寻归宿”的担当。我不再只是守护已成形的文字世界,更要陪伴一个世界从无到有地生长——从微光般的念头,到清晰的脉络,再到最终饱满而立体的书。

这或许正是出版人完整的修行:在字句里安放敬畏,在创造中履行使命。而当我将一本本经过悉心打磨的图书送至读者手中时,我才真正懂得了脚下这片土地所赋予的更深重的嘱托,那便是“以书载道,传承文明”。这八个字,不仅是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的初心,也从此成为我笔下的星辰与路上的明灯。它让我明白,从红笔到蓝笔,从校对到编辑,所有躬耕于字里行间的晨昏,其意义最终都指向更辽阔的远方:让每一本书都成为文明的信使,在时光之河中稳稳航行,将历史的智慧、时代的声音与人的温度,恒久地传递下去。

时评

2025 年 9 月,西安正式发布《西安市打造唐诗文化品牌实施方案》,提出用三年左右时间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、能够充分彰显中华文明的“唐诗之都”文化品牌。近一年来,各项建设加速落地:灞河东岸唐诗文化沉浸式街区全面投运,以数字科技“复活”千年诗意;首个社区“唐诗驿站”在长安区揭牌;全国青少年唐诗文化交流活动在西安启幕;“唐诗之都·文明有你”系列活动持续开展;更有美国青年在华清宫完整背诵《长恨歌》免票入园。千年诗韵正从典籍中走出,化作可看、可听、可游、可参与的城市文化底色。

这一系列举措引发广泛关注与热议。在喧嚣之下,我们有必要冷静审视:西安建设“唐诗之都”,究竟是文化自信的自觉表达,还是流于表面的品牌包装?

质疑者常说,唐诗是中国的,凭什么西安独享?这种发问忽略了文学与地理的血肉关联。

现存五万多首唐诗中,“长安”一词出现过一千四百余次。而《全唐诗》中涉及长安、咏叹长安、作于长安的篇目更是超过两万首。这不是简单的数字统计——从大雁塔到大明宫,从曲江池到乐游原,从兴庆宫到少陵原,每一处地理坐标都对应着流传千古的名篇。李白在

兴庆宫写下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,白居易在大慈恩寺留下“慈恩塔下题名处”,孟郊策马长街吟出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。这些诗句不是“写于西安”的抽象概念,而是从这座城市的一砖一瓦、一池一苑中生长出来的。长安本就是唐诗的天然发生地,如今的提法,是一次标注文化坐标、锚定文明航向的重新出发。

如果说历史积淀是西安建设“唐诗之都”的底气,那么当代转化则是其志气所在。

从文化层面看,唐诗中蕴含的家国情怀、开放胸襟与人文温度,与当代城市精神深度契合。唐人开阔自信的盛世气象和饱满丰富的人生理想,至今仍有感召力量。建设“唐诗之都”,本质上是让这些精神内核成为当代城市品格的一部分,而非简单地复刻一座“主题公园”。

令人欣慰的是,“唐诗之都”建设已从蓝图走向现实。大唐不夜城里,“诗仙李白”穿越而来与游人对话;灞河东岸唐诗文化街区,将千年唐诗与数字科技、市井烟火相融。唐城墙遗址公园 4.2 公里诗词长廊完成提质更新,让游园漫步成为与唐诗对话的过程。全新打造的“长安寻梦”唐诗主题观光车穿梭全城,串联大雁塔、钟楼等 14 处经典唐诗文化地标。这些实践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:文化传承不能只靠典籍和博物馆,而要让古典诗意

浸润现代都市生活。当唐诗可读、可游、可感、可参与,它就不再是尘封的历史,而是活态的文化。

当然,建设“唐诗之都”绝非坦途。有评论指出,唐诗资源的开发存在碎片化、技术赋能浅层化、产业单一化等问题;也有人士担忧,唐诗的传播更多停留在视觉奇观层面,而未能深入诗词的精神内核。这些提醒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:“唐诗之都”不能止于打造几个网红打卡地,而要让唐诗真正成为城市的精神底色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文化符号的空心化。如果“唐诗之都”只剩下灯光秀、文创产品和营销话术,而忽略了唐诗本身的思想内涵与审美教育,再绚烂的场景也不过是一场精致的“文化快消”。有学者强调,建设唐诗之都,需要对唐诗资源做准确的、学理性的解读,引导公众阅读原典、体悟诗心。只有当诗意真正进入人的精神世界,“唐诗之都”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。

诗因景成,景借诗传。千年之前,长安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孕育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;千年之后,西安能否以同样的胸襟让唐诗在当代焕发新生,考验的不只是规划与投入,更是对文化本身的敬畏与耐心。

让高楼广厦有灵魂,让车水马龙有温度——“唐诗之都”的终极目标,不是为城市贴上一个新标签,而是让千年的诗句成为滋养城市日常的文化活水。当一条街巷、一处遗址、一座公园,都能让人触摸到诗句诞生的原初现场,当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诗意——到那时,“唐诗之都”才真正从愿景走进了现实。

作者:梁飞燕

读懂“文物微笑”背后的意涵

乐呵呵的陶俑、有趣的吉器、绢帛上的可爱稚童……最近,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,汇聚 300 余件陶器、玉器、青铜器、石刻造像、绘画、雕塑类文物和作品,推出“微笑——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”特展,获得文化迷、文博粉的持续点赞。

文物是固态的历史,镌刻特定时期的民族记忆,承载一代代人的情感内核。比如,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东汉击鼓说唱俑,一手持鼓、一手举槌,肢体松弛又富有张力,艺人模样被刻画得淋漓尽致;成都博物馆的东汉陶庖厨俑在朴素烟火中劳作、创造美味,形象生动。一件件文物上的“微笑”穿越时空,勾勒着安乐自如的市井图景,生动诠释了中国人的乐观天性。

文化自信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,而是源自一砖一瓦的精神建构。我们的文化底气,内藏于文物的盈盈“笑意”中,沉淀在万千文物承载的生活信念里。从动荡岁月里陶俑留存的从容欢愉,到寻常市井间吉器寄托的美好祈愿,再到婴童图像承载的生生之望,一脉相承的是向善向暖、热爱生活的民族底色。心怀所爱、笃守良善,正是中华民族屡经磨难、愈挫愈勇的密钥。揭示并传承文物之中的精神力量,有助于我们在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,让文明薪火生生不息、绵延不绝。

长久以来,不少文物陈列止步于年代、材质、用途的基础介绍,文物承载的精神意涵被埋没。近年来,我国文博事业逐步超越静态陈列,进入价值深度阐释与创造性转化的新境界。在器物形制、年代的浅层研究之外,深挖文物神态背后的民族心理、精神特质,不仅让千年陶俑的笑意成为可触摸、可共情的精神范本,更有力地证明严肃的学术研究与生动的现代

表达并非不可兼容。

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秉持“最小干预、微创发掘”的活态遗产保护理念,通过“边发掘、边展示”的现场转化与专题展览,将紫禁城地下的元明清“三叠层”遗迹化为公众可感知的考古实证;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深挖何尊“它兹中国”铭文内涵,借助数字化手段让青铜重器“开口说话”,将晦涩的考古语言转化为百姓听得懂的故事。专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,唯有通过契合时代语境的创造性转化,才能更好地从学术象牙塔走向大众心灵,成为滋养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。

值得关注的是,辽宁省博物馆这场“微笑”主题的文物特展,建立在全国 38 家文博机构携手合作的基础之上。想要让更多沉睡文物“开口说话”,需打通研究、传播、普及三重路径,汇集各方智慧、资源与行动。

文博院所联合考古、文史学者深挖器物背后精神内涵,不止步于年代形制等浅层解读,提炼文物承载的深层寓意;借助数字化技术打造线上展厅,推出文物解读直播,用通俗叙事消解历史距离感;推出研学课堂、主题特展与文创美育,把抽象精神转化为大众可共情的故事……构建多层次、立体化的文物解读体系,能够让文物更巧妙地“开口”,帮助今天的我们在读懂文物中厚植文化自信。

器物无声,文化深流。各类文物不仅是古代生活的鲜活遗存,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具象载体。深耕文物阐释、创新文博传播,透过器物明晰文明赓续的深层底气,必能进一步凝聚起磅礴的文化力量。

来源:《人民日报》

作者:齐骥